



扔掉沙发，一个昂贵的念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把沙发扔了吧——只有起了这个念头，才能意识到这有多昂贵。

湖北的一位居民花了197元扔掉家里的皮质沙发。而当听到200元的报价时，另一位上海的居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无论是几百、几千、几万元买回来的沙发，到扔的时候，都可能一文不值，还得倒贴钱。而这只是一项工程的开始。

由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通知》指出，到2025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批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典型城市，培育一批回收龙头企业，推广一批典型经验模式。

今年，已经有多个城市推出大件垃圾处理的管理办法。试点多年的广州市白云区城管局每年要拿出约700万元经费支持大件家具收运和处理的项目。而受补贴的处理中心坦言，如果不是这笔钱，他们的工作根本难以为继。

“我们拿挣钱的意思裹着不挣钱的意思。”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大件垃圾集中拆解暨再生资源处置中心负责人高超说，他们全靠主营的再生资源回收业务来补贴处理旧沙发等废旧家具的亏损。

买沙发要花钱，扔个沙发，从市民、企业到政府，怎么还觉得贵？

尴尬的回收之路

孙洁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考虑到底该怎么处置家里的旧沙发。

毕竟城市里的一切空间都是有价格的。她的房子77平方米，三人座的皮质沙发不想卖了，放在客厅“实在浪费位置”。

沙发用了十多年，已经很难卖给二手市场。在北京经营二手家具回收和清理业务的王伟说，皮质沙发，只要有划痕，他们一概不收。

收回去不仅要运输成本，摆在卖场的空间里要是卖不掉，仓储成本也不低。在所有二手家具里，王伟评价说：“沙发是最难卖的，太大了”。

老式的转角沙发也不受欢迎，现在流行直排的。王伟说：“（买二手的租客）租的房间都比较小，一个转角沙发占客厅一大片，不好卖。”

二手市场里最受欢迎的沙发，一看材质——最好是实木的，二看品牌——最好价格不菲。而满足这两点的货源并不多。王伟说，加上这几年二手市场行情不好，以前那种能当二手卖的，现在可能就只能当大件垃圾了”。

如果在线上二手平台也卖不掉，送也送不出去，业主们就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了——从家具到垃圾，存在巨大的价值落差。

买一张新沙发的价钱，除了制作成本，还要加上厂家的利润、从厂家到卖场的运费、卖场的仓储成本、卖场的利润、导购员的收入、从卖场到客户家的运输成本、搬上楼的搬运成本、安装成本、相关环节的税收成本等。

而当买卖行为结束，沙发放在家里，就是一个由布料、皮革、海绵和几块木头组成的大型物件。

许多家具都遵循着这个规律。一位网友自己将床垫里的弹簧拆解出来，心痛地感慨：“大几千元买的床垫，废铁卖了



孙洁花钱扔掉的旧沙发。

受访者供图

25元啊。”

沙发里的铁更少，比床垫更廉价。它从里到外，都是低值可回收物——平均毛利率低于5%。

即便是楼下踩着三轮车收废品的师傅，也很少会为了这些不值钱的大物件上门搬一趟。这一点孙洁知道，几年前，她找收废品的大爷回收一台旧洗衣机，里头有铜、铝、铁，就这样，也是劝说了半天才勉强拉走。

有人去问了家附近的小型废品回收站，老板宁收几个纸箱，也不肯收一个沙发。

沙发用了十多年，没有等到专门的回收，而是流入垃圾处置渠道，最终进行焚烧或填埋处置。这个过程增加了垃圾处理的总量，也使垃圾压缩设备和填埋场的寿命缩短。

长久以来，中国存在城市环卫和再生资源回收两个系统。前者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由市政部门负责，系统的终点是焚烧或填埋场；而后者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由个人及企业主导，终点是资源的回收利用。

当拾废品的入、走街串巷零散收购的小商贩——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协会统计，这两类经营者占了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从业人员的90%以上——不再愿意收走笨重的沙发，居民大概率只能当作垃圾扔掉了”。

而怎么扔，扔在哪里，又是新问题。

要把沙发扔掉，总共分几步

沉重的沙发要下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付费清运。

我国多个城市规定，大件垃圾处理遵循“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的原则。但西安、济南等地的城管部门先后调研发现，市民对于有偿处理大件垃圾的接受程度普遍不高。

王伟也经营“代扔”业务，即业主付费，清运人员上门把废弃家具拉走，代业主处理。但据他介绍，这样的订单并不多，10个咨询单里，9个谈不成，“很多都是因为价格（太贵）”。

有网友想去个衣柜，一听“代扔”报价680元，比买衣柜的价格还贵。她找了几个力气大的朋友帮忙抬走，请他们吃饭只花了200多元。

有人舍不得花扔旧床垫的钱，于是忍着腰痛睡了几年。舍不得出沙发清运费的人自己硬扛，结果伤到腰椎，花了8000元治疗费。

“这扔大垃圾收钱真是和国际接轨啊。”一个在国外做垃圾回收的中国人感慨。“澳大利亚这边垃圾场处理个床垫都要收费40-50澳币，老鼻子贵了（东北方言，意思为特别贵——编者注），现在国内也有往这上面的趋势。”另一位身在国外的网友说。

孙洁能够接受为“代扔”付费，但她希望价格能再低点。但王伟说，考虑到运营成本，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并不算高。

据他介绍，清运公司的场地要大，考虑到租金成本，多位于城市的边缘。而业务往往在城内，来回交通成本高。除此之外，还有搬运成本、拆解成本。

王伟的厂子开在大兴区。因此即便在海淀区接单，他也得把沙发拉回大兴处理。清运公司如果与垃圾回收站没有其他业务合作，单独交付沙发，还得给回收站付不少费用。

一些不想付费清运的业主，哪怕空有一身力气，可能也不知道该把沙发搬到哪里。

有些沙发勉强被抬出了家门。今年1月，广东东莞一小区发生火灾，燃烧物就是被业主堆放在楼道里的废旧家具。

沙发不像可乐瓶，到处都有垃圾桶可以扔。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中，沙发被单列为“大件垃圾”，不能与塑料、纸质、金属等可回收物一并处理，应当“投放在指定的收集场所”。

北京、深圳、厦门等一部分城市要求小区或街道设置大件垃圾堆放点，居民可自

行搬运至此，或预约付费的上门搬运服务。

广州市白云区城管局就在垃圾分类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两网融合”的基础上，做了这样的尝试。

城管局分类科的毛雪骏介绍，全区共设立了120多个大件垃圾临时存放点，居民可以自行送至存放点，也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上门服务。

上门的搬运工就是该片区的环卫工，费用由业主当面付给他们，价格参考外卖平台的“跑腿”业务。“其实相当于是在本职工作以外赚点外快。”毛雪骏说，环卫工之后会用工作车将废旧家具送至暂存点。

德国很早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公共垃圾管理部门有义务对在其辖区内私人家庭中产生的大件垃圾予以收运。至于付费方式，每个城市针对每年免费回收大件垃圾的次数、日期和数量都有着不同规定。

在国内，这种做法仍在部分城市试点中，尚未大规模普及。城管部门组织设置存放点，需要协调街道、社区找出闲置充足、交通便利、相对固定的地块，存在选址困难；还需出资向企业购买清运服务，财政压力大。

孙洁不清楚家附近有没有投放点。她只见过有人把大件垃圾堆在小区垃圾桶旁边，“我觉得那样可能不太好”。

随意倾倒或堆放大件垃圾的业主，有的会被物业查到监控找上门，甚至有人交了罚款。

为了不处处罚，不少人大费周章，买来锯子自己在家拆解，直至拆成碎片，每天拿一点下楼扔到垃圾桶。

网友还总结出另一种方法，叫货拉拉上门拉走，让师傅随便找个地方处理。比“代扔”便宜不少。

还有许多无计可施的人趁着天黑将自己家的沙发搬出去，找个空地放下。“stooping”一搬(stooping原意为“弯腰”，指在街头拾获二手家具的行为，最初兴起于国外——记者注)因此也常在深夜出没。

天亮之后，废旧的沙发可能出现在城市市里的任何地方。几年前，甚至有艺术家做了一个“北京沙发计划”的在线摄影展，专



8月8日，从沙发、床垫中拆出的海绵，堆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大件垃圾集中拆解暨再生资源处置中心的场地里，之后将会被统一压缩回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8月8日，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大件垃圾集中拆解暨再生资源处置中心，还没拆解的旧沙发堆在地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门收集这种放在街上的“生活艺术”。在市井的惜物传统下，有些沙发会成为供人休息、聚会下棋、晾晒衣物、张贴广告，甚至供奉菩萨的地方。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专家组曾赴华北、山东、华东、华南、西南15个城市调研，发现包括废旧家具在内的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处理，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支持，仅靠市场价值规律难以驱动。

“（回收大件家具）这一块本来就是赔钱的买卖，谁愿意干？”高超说。

廉价又昂贵的沙发，政府“抬”

自从和乡镇政府签了合同后，高超每天都得把镇里二十几个投放点运来的大件垃圾账单全收。

2021年，北京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通知意见》。截至2025年，政府称已在全市居住小区（村）共设置了1万多个大件垃圾投放点，确定了161家大件垃圾托底回收单位。

“我们每年大件（垃圾处理）都赔一两百万。”托底回收单位之一的负责人高超坐在办公室，拿了张纸，不情不愿地跟记者算这笔账。

运来的废旧沙发和床垫，攒够一定数量，得从镇里雇五六个临时工来拆解。“10块钱一个人。”他算道，“一天下来，手快一点，（每人）也能挣200多块钱。这是一项成本。

拆出来的木料要上机器粉碎，海绵要压缩。接下来打包装车。算上电费、机油、人工费，还有捆包的铁丝，打一包成本约30元，约六七百斤重。

而最终卖给发电厂用于燃烧发电的沙发木料，价格只有25元一吨。

“因为沙发的木料有时候掺有别的东西，（烧了）冒那种烟，跟木头不一样的，”高超抱怨着，“要不说这东西都是赔钱买卖”。

他想了一些办法，例如把环卫清运树的树枝和沙发木料掺在一起，就能按树木的价格卖给发电厂，120元一吨。或者把大块的木头板和沙发木料掺在一起，送去压

缩板厂，一吨能卖320元左右。

广州市白云区大件家具处理中心的办法是，用全自动生产设备提高效率，让能卖钱的东西再多一点。

该项目负责人、白云供销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冠钊介绍，在初期，处理中心也采用人工拆解。把金属、木料拆出来后，剩下的海绵、皮革、布料都作为垃圾处理。

白云区人口众多，城中村密集，每年产生约4600吨大件废弃家具。“人工拆解的效率太低了。”白冠钊介绍，“当时（大件家具收运的）前端还没统筹起来，我们单靠10来个人拆解，就已经没办法达到日产自清了。”

半年后，他们引入了省内首个大件家具全自动一体化处理设备。工人用铲车将家具送到机器入口，经过破碎、风选、磁选、高温挤压等一系列处理工艺，机器就能直接“吐”出来金属类、木料类和RDF燃料棒（用布料、海绵等可燃性垃圾制成的燃料，热值高，易运输及贮存——记者注）三大产品，可实现大件家具100%资源化利用——金属类回收，后两类分别卖给发电厂和水泥厂燃烧供能。

现在全区128个临时收集点的废旧家具都被送到这里来。处理中心的周锦棠介绍，截至今年8月，中心已累计处理大件家具约2.88万车次，资源化处理2.07万吨，相当于白云区垃圾减容39.94万立方米。

这种被称为“白云经验”的做法，白冠钊坦言，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可复制。作为一种重资产低回报的项目，要在一线城市、在具备足够的人口体量和废弃家具量的基础上，加上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盈亏平衡。

广州市白云区供销合作联社下属的白云供销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目前主营两个项目：废旧玻璃分拣中心和大件家具处理中心——都属于低值可回收物处理，前者能自负盈亏，后者仍需靠政府补贴。

“大件”的“大”再次和“贵”画上等号。处理大件家具的机械设备长60米，高8米，购入价格几乎是废玻璃处理设备的5倍，日均耗电也是其3倍，最终产品却并不比废玻璃的回收价更高。除此之外，废玻璃的项目可享受国家90%的退税，而大件家具处理中心没有任何税收优惠。

投产4年多，大件家具处理中心还没有把设备的成本赚回来。只是在覆盖运营成本的基础上“微盈利”。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占了中心经营资金的70%左右，即便木料、金属等资源100%回收利用，也无法覆盖运营费用。

废弃的沙发最终成为政府的负担和痛点。中研院（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院在对某市的大件垃圾收运处理现状调研时发现，“政府目前承担大部分大件垃圾处理费用，财政压力大，随着垃圾分类补贴逐步减少，资金缺口压力与日俱增”。

高超自称拿到的政府补贴不多，但好在相关部门给了他再生资源业务的经营许可。他的厂子约80亩地，有废铁、旧金属、杂货、大件垃圾四个分区。他只把前三项称为再生资源——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回收业务，大件在他看来是“不产生价值”的垃圾——宋庄以外的人送来的，绝对不收。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互惠合作。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建议：企业只有当提供的服务既能发挥本身的业务经营优势，并且能解决政府的痛点时，才能获得政府的认可以及大力支持，而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处理恰恰是一个切入点。

今年1月，商务部等部门将全国32个城市、78家企业列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and 试点企业。这里的沙发建设着走更长的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

今年6月30日，刘勇在印度洋的海面上吃了一块巧克力——这是他收到的56岁生日礼物。他对着大海和星空许愿，第一希望世界和平，第二希望顺利抵达终点。

当时，这名探险家已经在海上漂了45天。此前，他和另外3名队友，驾驶一艘长8米的无动力小船，仅靠人力划桨，挑战从东向西横渡印度洋。这是他的冒险，也是他的科研。

正值南半球冬季对探险者最“友善”的时间窗口，一群英国人比刘勇他们早2.5天出发——无论谁先抵达，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无后援、无动力划船横渡印度洋的团队。

两年前，刘勇还曾以同样的方式横渡大西洋。如果印度洋之行顺利，他会是首位划桨横渡两大洋的亚洲人。

船上的日常是，两人一组划船两小时、休息，换另一组划。刘勇的3名队友来自欧洲，分别是银行家、护士和网络工程师。除了必要的交流，他们很少谈及自己的生活。即使说话，人的声音也很容易淹没在海浪与海风的双重呼啸中。

出发几十天后，刘勇身上几乎找不到一处完好的皮肤了，坐在船上划桨时，他感觉浑身被烙铁灼烧，靠止痛药缓解疼痛。

不在冒险路上时，刘勇是四川旅游学院山地旅游学院院长。这名教授每个学期最少要给本科生授课32课时，要带着研究生去四川山区做田野调查，还主导了一个专注山地旅游的科研团队。他发表的专著、译著、高水平论文超过200万字，手头上还有好几个科研课题正在进行。

抓着桨在印度洋上划船时，刘勇也抓着工作进度。他利用卫星通信，参加了两次科研例会，远程盯着学生的论文。他团队里有3名研究生刚刚成功申请赴海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小船上表达了喜悦与祝福。

刘勇的一名研究生王金鹏记得，导师在印度洋上参加科研例会时，镜头中的他

传奇

一边划船横渡大洋，一边开学术例会



当地时间7月21日傍晚，快抵达坦桑尼亚的海岸时，刘勇挥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刘勇（左一）带学生在野外调研。



刘勇和队友划过约8500公里。

随着海浪的起伏摇晃。王金鹏觉得导师老了很多，声音发哑，胡子、头发都白了，和平常学校里穿着POLO衫、戴着金属边框眼镜的那个“绅士”很不同。

每隔一段时间，刘勇会收到学生确认他平安的信息，也收到他们的科研进度汇报。四川旅游学院教师李婷婷回忆，有一次，刘勇“消失”了5天，他的同事、学生互相打听情况。后来，刘勇出现了，他回复说因为连日阴天，船上的太阳能板充电不足，网络连接失去能源供给。

这艘小船挑战的是印度洋最长的航线，从澳大利亚西岸的卡那封出发，沿途没有海运、航空航线，没有前人经验，有一次，刘勇“消失”了5天，他的同事、学生互相打听情况。后来，刘勇出现了，他回复说因为连日阴天，船上的太阳能板充电不足，网络连接失去能源供给。

这艘小船挑战的是印度洋最长的航线，从澳大利亚西岸的卡那封出发，沿途没有海运、航空航线，没有前人经验，有一次，刘勇“消失”了5天，他的同事、学生互相打听情况。后来，刘勇出现了，他回复说因为连日阴天，船上的太阳能板充电不足，网络连接失去能源供给。

即便是风平浪静的时候，身高1.88米的刘勇和另一位队友挤在两米长的船舱里，也很不舒服。他回忆，海水会不断涌

进船舱，打湿睡袋、衣物，人很难翻身，脚总是得蜷缩着。海水泡透了他的身躯，连那动屁股都特别疼。

他们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罗盘导航，用制水机把海水转化成淡水。在各种户外脱水食品中，他只喜欢咖喱炒饭。上船的第一个月，刘勇晕船严重，一度划船边呕吐。大浪把船桨弹回来，打在他的腿上、手上。

“依靠人力划桨，抵抗不了洋流。”刘勇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他一度濒临绝望，有种“死不了，却又到不了岸”的感觉。

刘勇挑战的印度洋，特有的生态风貌加重了他的孤独感。他对学生描述，两年前，他划过大西洋，沿途看到许多海洋动物，海里有鱼，天上有鸟，不会觉得很单调，但在印度洋上他偶尔才看到鱼。曾有一个月的航程，他发现周围上千公里内都没有小岛，甚至很多时候天空中看不到鸟。

他说，横渡大西洋就像在看得见光亮出口的隧道里开车，印度洋上则充满了未知，看不到有光的出口。

刘勇通过处理眼前的麻烦缓解情绪，比如，他认真修理被海浪拍坏的制水机，包扎身上的伤口。“平常不懂得珍惜的小事，在那会儿懂得珍惜了，比如喝一杯干净的水。”

他用大段大段的时间与自己对话。刘勇说，自己爱上探险，也是迷上了在自然环境中独处的感觉。

他在海上想清楚了，平时评参荣誉奖项需要花时间准备申报材料，可那些“称号”不能说明个人研究水平，耗费许多精力填表、汇报，可以舍弃；能研究的学术方向那么多，要花时间真正的兴趣点上。他家有小小花园，一直拖延着没改造，横渡大西洋后，他按照在船上的设计思考重新装饰了小花园的地面，再种上一些喜欢的花。

他带着录音笔上船，记录每天的天、洋流、团队成员的状态、自己的观察、每一次突发事故。一名想当网红的队友几乎没有过探险经验，带着不必要的行李，占用狭小船舱的空间，还说只要付了钱就要无限量上网、用电。

极……他掌握攀冰、皮划艇、摩托越野、冲浪等技能。因为对山地探险太熟悉，已经“没有未知感”，他决定把探险地转向远洋，尤其是在探险圈公认难度最大、海况最复杂的跨洋划船。

在科研领域，他是四川旅游学院建校以来第一个拿到本学科国家社科基金的教授。王金鹏形容，刘勇性格平静，因为探险时经历的危险时刻太多，生活和工作上的“大事”在他眼里成了都能解决的“小事”。

他的研究生向明霞说，当科研团队进度慢或是学生调研遇到困难时，刘勇总是说，“没事，我来处理”。他的同事李婷婷说，刘勇做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全世界范围内，做海洋探险民族志研究的很少，”刘勇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学术圈做探险行为研究的也少，许多探险参与者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思维训练，也很难在探险中进行相关学术研究”。

他的录音笔记录着，快到坦桑尼亚时，队友坚持绕行60海里到肯尼亚海岸，挑战人类最长划行记录，刘勇却认为，抵达坦桑尼亚已经完成首次横跨印度洋探险，且根据海况和气象情况，在坦桑尼亚靠岸更安全。

他尽力说服3名欧洲队友：只要在坦桑尼亚靠岸，就能超越那支比他们提前出发的英国队伍。

在那段录音里，他的队友说，“必须赢”。刘勇说，“我们已经赢了”。

最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成了他们这趟探险的终点。4个人花了65天1小时45分，划了约8500公里，突破了多项世界纪录：人类史上首次无动力划船横渡印度洋、以团队形式、划行距离最长、时间最短。快靠岸时，刘勇站在船上，挥起了提前准备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不久后的7月31日下午，刘勇站在四川旅游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向听众展示他身上深浅不一的疤痕、正在愈合的伤口，分享他在印度洋上的经历。那天，他已经刮掉了胡须，戴回了眼镜，变回了那位文质彬彬的刘教授。